



及白釉绿彩瓷、越窑青瓷。从“黑石号”上装载的长沙窑瓷器数量可看出，长沙窑应是“三驾马车”中的领跑者。

五代时期的印坦沉船出水中国陶瓷 7000 余件，其中广东青瓷占比约 66%，越窑



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。

青瓷占比 30%。五代宋初的井里汶沉船出水中国陶瓷约 30 万件，绝大多数为越窑青瓷。依照以上数据分析，长沙窑瓷器、越窑青瓷、广东青瓷、北方白瓷，实为当时中国外销瓷的“主力军”，故研究者常称之为“四组合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晚唐至宋初外销瓷的这一波高峰，正发生在中国藩镇割据、军阀混战的分裂时期，竞争态势激烈残酷，地方政权为了扩充财源，总得放手一搏，于山河湖海间“走出去”，惊涛骇浪里冒险闯关、各显神通。

宋元时期，青白瓷和龙泉窑青瓷成为瓷器贸易的大宗产品，青白瓷除来自景德镇，还来自福建德化。泉州港的发展为福建窑业提供了新契机，南宋沉船“南海一号”上福建德化的青白瓷，就是德化窑仿照景德镇青白瓷而生产的。南宋时期，福建陶瓷取代广东陶瓷，在外销瓷中占据较高比例，也与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向泉州转移有关。

研究中国陶瓷文化史，离不开亚洲视野、全球视野。比如宋代的汝窑烧造捧槌瓶，器型来自波斯的玻璃制品。南宋《诸蕃志》介绍：登流眉国（今马来半岛）“饮食以葵叶为碗，不施匙筯，掬而食之”；渤泥国（今文莱）“无器皿，以竹编、贝多叶为器，食毕则弃之”。中国陶瓷器输入以后，这种精良、卫生又实用的器皿让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用器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元青花的造型并不规则，

既有胎体厚重的大罐、大瓶、大盘、大碗等，也有胎体轻薄的高足碗、高足杯、匜、盘等，以满足不同地域、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。如大罐、大瓶、大盘、大碗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席地而坐、一起吃饭的习惯而专门生产的大型饮食器皿；小型器皿如小罐、小瓶、小壶则多销往菲律宾。

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新航路后，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的影响力变得“无远弗届”。对瓷器上了头的欧洲人，称其为“白色的金子”。15 世纪，意大利地区作为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，已开启了欧洲最早的中国瓷器收藏。艺术史家统计，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从 14 世纪末崛起到 18 世纪中期没落期间，共收藏中国瓷器 1125 件。弗朗切斯科一世还和兄弟费迪南多一世试制出欧洲第一例软质瓷。波旁家族的卡洛斯三世身兼那不勒斯、西西里和西班牙三地国王。他于 1734 年来到那不勒斯，掀起了那不勒斯宫廷的“中国风”。1741 年，他在大皇宫的花园里建起了皇家瓷器厂，瓷器厂最伟大的作品是在 1757 年至 1759 年间为玛丽亚王后建造的波蒂奇庄园内的瓷器室——全欧洲最精致的“中国风”作品之一。

事实上，瓷器室最早出现在几乎垄断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东亚瓷器进口的荷兰。由于荷兰与普鲁士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，普鲁士宫廷遂成为德意志地区最早建立东亚瓷器室的宫廷。而普鲁士以南萨克森公国选帝侯、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更身体力行何谓“发瓷疯”：“我

左：景德镇青白瓷牡丹唐草纹梅瓶，南宋，爱知县陶磁美术馆藏。右：濑户窑灰釉菊花纹瓶子，14 世纪，爱知县陶磁美术馆藏。濑户窑瓶子的器型是以景德镇梅瓶为蓝本仿造。

